

巴赫金小说理论：背景、线索与特色

凌建侯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20世纪30—40年代初是巴赫金专攻小说理论时期。1981年英文版《对话性想象》问世,随之“巴赫金小说理论”作为专名在西方流传开来,对当时或新或旧的理论流派产生了影响。小说研究在巴赫金学术生涯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前承哲学美学探索,后启哲学人类学思考。巴赫金从哲学美学跨入语文学(文艺学/语言学)领域,努力探寻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体裁的源流,而从基督教渊源转向民间笑(狂欢)文化渊源,又使他求索到堪与早期所批判之独白思维倾向相抗衡的反独白思维倾向,最终假诗学之形确立有哲学之实的独白论与反独白论互动关系的文化思维体系。从研究起点与内在线索、学理架构与思想格局看,特别就人文科学新范式而言,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是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文艺学无法容纳下的,其整套术语及理论学说,也早应引起哲学界的重视了。

关键词: 巴赫金小说理论; 基督教与民间笑文化; 对话与狂欢; 独白论与反独白论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9) 05-0188-10

面对巴赫金小说理论遗产,后辈学人仔细寻绎、探赜索隐,不断得到新的体悟,收获新的发现。究其根源,在于巴赫金的学术思维具有超前性、开放性、跨界性、微观与宏观融为一体性等特质,其论著可供启迪的思想资源非常丰富。诚然,任何理论都不会凭空出现,探析其“前因”和“后果”,梳析其内在思想发展线索,有助于更合理地阐明其创新之处,更深刻地窥得其核心特色。“每一起文化行为都是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①,巴赫金喜欢采用边缘性视角,看似在论专题,实则已越出具体学科范围,背后总能触及文化、哲学领域的大问题。如钱中文先生所说,“他的根本性的构思,如交往哲学、对话哲学,竟能深入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干预我们的实际存在的生活层面”^②,而这类大问题又暗中指向更高层面的文化思维倾向,形成巴赫金所特有的开放的理论架构。这是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思想体系,其内核是独白与反独白思维倾向的互动关系,任何现实行为、文化活动、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等,都能在这个开放的思维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断丰富、充实这个体系。在探索小说理论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开放的思维体系,为此建立起相应的人文研究新范式,是巴赫金对世界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正是凭借这份特殊的贡献,他才有机会被公认为是传统的学者,现代的、后现代的、“理论之后”时代的学者,并在20世纪被归入“下个千年思想家”^③的行列。

一、单一的传统与稀缺的理论

1975年,巴赫金的第一本文集《文学与美学诸问题》出版。全书共收录6篇文章,有4篇长文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7YJAH05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82)。

作者简介: 凌建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 西方诗学与比较诗学、俄语文学与世界文化关系。

①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

②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15-16页。

③ 鲍涅茨卡娅《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生平与哲学思想》,《哲学问题》(俄文版)1995年第10期。

(《长篇小说的话语——论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史诗与长篇小说——论长篇小说研究方法》)是专论长篇小说体裁的力作。实际上它们均撰写于20世纪30年代。1934—1935年巴赫金以“长篇小说的话语”为题完成了一部书稿,主要探讨了小说体裁和文学话语两个问题,该书稿后来被拆成《诗歌的话语与小说的话语》《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史诗与长篇小说》三篇论文,于1965—1972年间陆续发表在期刊《文学问题》与文集《俄罗斯与国外的文学》上;论时空体一文的主体部分写于1937—1938年,“结束语”增补于1973年,全文于1974年由《文学问题》刊出。^①1981年,美国学者选编出版了这4篇长文,辑为英文版文集,取名“对话性想象:巴赫金论文四篇”^②。此后,“巴赫金小说理论”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在西方学术界迅速流传开来。

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巴赫金主攻长篇小说体裁时期,当时已有一些小说专论问世,最著名的当推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小说理论》(1920),而格里弗佐夫(B. A. Gritsov)的《小说理论》(1927)、维诺格拉多夫(V. V. Vinogradov)的《论艺术散文》(1930)只在苏联流行。二战之后,有关小说的著述不断增多,但是厚重之作依然稀缺,影响较大的也不过寥寥数部,如伊恩·P. 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1957)、吕西安·戈尔德曼的《论小说的社会学》(1964)。在巴赫金“被发现”前,准确地说,在上述4篇长文出版前,小说研究通常遵循由黑格尔开创、经卢卡奇发扬的传统——对史诗的怀念和对发端于史诗的小说形式的期待。

巴赫金对“长篇小说风格大多数情况下被归于‘史诗风格’”深表不满,批判俄罗斯哲学家施佩特(G. G. Shpet)把小说看成“道德说教的现代形式……非艺术性的雄辩体裁”,驳斥艾亨鲍姆(B. M. Eikhenbaum)解释小说时求助于“雄辩术形式”的做法,也反对维诺格拉多夫视小说为“雄辩术和纯诗作之混合物”的观点。^③他认为,体裁上缺乏稳定性、程式化和明晰性等所谓的消极因素,恰恰应该被看作是小说的优势之所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长篇小说体裁的特殊性,将其从文学史上低下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其成为一种优秀的文类,使其从纯文学领域纵身一跃,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文化领域”^④。施佩特深受德国学术的影响,在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于1927年出版专著《词的内部形式》,小说与史诗的关系在书中只被附带论及,但巴赫金还是读出了上述基本立场。2007年,施佩特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哲学手稿被整理出版,使读者有机会看到他对小说更明晰、更直接的定位“长篇小说终究不具备自己的形式”,它不过是“史诗(在叙事—雄辩上)的退化”。^⑤很明显,施佩特继承了黑格尔的传统,而且在抑小说、扬史诗这一点上,比前人走得更远,立场更为激进。巴赫金与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的核心成员,如什克洛夫斯基(V. B. Shklovskii)、雅各布森(R. O. Jakobson)、蒂尼亚诺夫(Y. N. Tynianov)、艾亨鲍姆等,和外围成员,如日尔蒙斯基(V. M. Zhirmunskii)、维诺格拉多夫,均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当他们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时候,1879年生辰的施佩特已是很有影响的名学者了。仅就小说体裁研究来说,虽然艾亨鲍姆、维诺格拉多夫具有折中倾向,但是来源于史诗的基本见解,无疑继承了黑格尔—卢卡奇—施佩特的传统。

① 巴赫金《文学与美学诸问题(不同年代的研究)》,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说明”,第4-5页。

②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 ed. Michael Holquist, Trans. by Caryl Emerson &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③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2、44-45页;亦可参见《巴赫金文集》第3卷,莫斯科“斯拉夫文化诸语言”出版社,2012年,第18、20-21页。

④ 加林·吉哈诺夫《米哈伊尔·巴赫金:含义不同的发现与文化转型》,汪洪章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关于巴赫金与黑格尔—卢卡奇小说研究传统的关系,亦可参见Galina Tihanov, *The Master and the Slave: Lukács, Bakhtin, and the Ideas of Their Time*, Oxford: Oxford UP, 2000.

⑤ 施佩特《文化哲学选集:作为知识门类的艺术》,莫斯科“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49-89页,转引自《巴赫金文集》第3卷,莫斯科“斯拉夫文化诸语言”出版社,2012年,第735页。

巴赫金研究小说理论的学术背景相当复杂，涉及当时俄罗斯国内的广泛讨论，也或明或暗地回应德、法学者，尤其是后者关于歌德、拉伯雷小说研究方法的争论。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巴赫金一反当时流行的观点——小说是史诗与戏剧的混合物，试图另起炉灶，为长篇小说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即寻找史诗之外的体裁来源。在1943年写就的补充性材料《长篇小说理论与历史诸问题》中，巴赫金旗帜鲜明地指出，现有的文学理论根本无法满足小说体裁研究的需要：

长篇小说改造了欧洲的文学思维。文学、文学形象、文学话语不再是它们在长篇小说占主导地位之前的那个样子了。然而，文学理论一如以前（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长篇小说也应该改造关于文学的理论思维。世界、人、话语的模式本身在长篇小说那里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还有形象建构的基础本身。^①

在巴赫金写下这段文字之前及之后很长时间里，小说研究始终没有突破史诗来源的窠臼，难怪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会发出感叹“如果巴赫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西方批评者所付出的大部分努力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肤浅的，要么既错误又肤浅。”^②“错误”与“肤浅”的说法不免夸大其词，毕竟黑格尔的传统并未被全盘推翻。巴赫金把长篇小说体裁分成两条“修辞路线”^③，第一条归属于史诗—雄辩体，第二条为他所首创，其源头被追溯到了古代民间笑文化。正是这两条路线的彼此交织与相互斗争，共同推动了小说体裁的形成与不断演进。

巴赫金小说理论也如同其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其他理论，在被低估中不断得到修正与补充，历久弥新，影响广泛、深刻而持久。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认为，巴赫金研究小说时打破常规，从既有观念的对立面出发，挖掘出与之形成对话关系的新思想。^④毫无疑问，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新思想，在对黑格尔传统的反拨中凸显出独具一格的活力，在受巴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的推崇中展现出非同一般的魅力。顺应20世纪80年代前小说理论杰作之稀缺语境，巴赫金小说理论（俄文原著文集出版后第5年英文版问世，很快引起了欧美学界极大的阅读热情，对叙事学^⑤、解构主义耶鲁学派^⑥、接受美学^⑦、后殖民理论^⑧、新史学^⑨等理论流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德·曼（Paul de Man）总结称，托多罗夫（T. Todorov）和霍奎斯特对巴赫金的赞誉，“都出自于巴赫金对小说理论的贡献”，他为能在其小说理论中读出“阐释学的力量”而赞叹不已。^⑩

二、从基督教转向民间笑（狂欢）文化

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第3卷《小说理论（1930—1961）》问世于2012年，共收录18篇文字，

① 《巴赫金文集》第3卷，莫斯科“斯拉夫文化诸语言”出版社，2012年，第655页。

② M. M.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ed. & Trans. by Caryl Emerso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Introduction", p. xxv.

③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51-210页。

④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 ed. Michael Holquist, Trans. by Caryl Emerson &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Introduction", p. xvii.

⑤ David Herman & Manfred Jahn, et al.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60.

⑥ 周启超、王加兴主编《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50页。

⑦ 周启超、王加兴主编《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⑧ Homi K.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 May 1817," *Critical Inquiry*, Vol. 12, No. 1, 1985, pp. 144-165.

⑨ Hayden White, "The Nineteenth-Century as Chronotope," *Nineteenth Century Contexts*, Vol. 11, No. 2, 1987, pp. 119-129; 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33页；简·布雷默、赫尔曼·茹登伯格编《搞笑——幽默文化史》，北塔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6-77页。

⑩ 周启超、王加兴主编《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49-51页。

除了《长篇小说理论与历史诸问题》《长篇小说》两文、三封书信、一份德俄双语读书笔记之外，其他所有篇目均创作于1930—1941年间。与文集《文学与美学诸问题》相比，第3卷把《史诗与长篇小说》还原为最初讲座稿《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状态。构成巴赫金小说理论之基本内容的，除了上述4篇长文外，还有遗失的专著手稿《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意义》的详细提纲。20世纪40年代初之前是巴赫金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其大多数重要论著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或完成了主体部分，且大多与“巴赫金毕生的主要事业——研究长篇小说的历史与理论”^①有关。不过，巴赫金在考察小说理论问题的过程中，立场发生过一次重大而有趣的“转向”。

在1929年6月初出版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中，巴赫金提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与《圣经》对话的相似，而与柏拉图对话的不同，还隐约透露出有机会要一探究竟的想法：

不是作为独白性结论的思想，哪怕结论是辩证性的，而是各种声音相互作用的事件，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终极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以此区别于柏拉图的对话。就后者而言，它是完全独白化的、教育型的对话，众多声音终究被吞噬在了思想中。思想并未被柏拉图看作是事件，而被看成是存在。参与思想，意味着参与思想的存在。不过，认知的人们之间，因他们对思想的参与程度不同而造成的一切充满等级的相互关系，最终都被整个思想本身所抹灭。我们认为，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与柏拉图的对话，完全是无关紧要和徒劳无益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根本不是纯认知的、哲学的对话。更有意义的是把其对话与《圣经》及《福音书》对话进行比较。约伯的对话和《福音书》的某些对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毋庸置疑，而柏拉图式的对话根本不在他的兴趣范围内。约伯的对话，就其结构而言，具有内在的无尽性，因为心灵与上帝的对峙——不管是斗争还是顺服——在其对话中都被视为是必定的和永恒的。不过，我们不会做出《圣经》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最本质艺术特征之根源的结论。提出影响和结构相似的问题之前，必须用眼见为实的材料揭示这些特征。^②

1963年，巴赫金增补、修订出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不但删除了以上数段文字，而且还另辟蹊径，从看似全新的角度阐发复调小说的体裁来源。变化之大，令人惊讶。但是，考察巴赫金的学术发展逻辑，一切都有迹可循，且完全没有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原子论转向日常言论的那种“违和”感。我们试着从后往前逆推这一“转向”的线索。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份笔记里巴赫金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现成的基督教转向希腊化时代的前基督教。”^③这行文字说明，在研究小说理论时期，复调小说体裁来源于基督教的看法，已悄然发生重大转变。《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第四章，实际是对此看法的具体化，而就其内容而言，亦可理解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来自基督教对话的进一步前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甚至更早的民间笑文化。古基督教或早期基督教文学受到梅尼普讽刺体的“决定性影响”，及至中世纪，“在直接继承古基督文学传统的拉丁宗教文学的某些体裁里”，梅尼普体的特点“继续存在并不断更新”^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既熟悉基督教正经文学，也了解基督教伪经文学，因此其创作中会出现“基督教化了的梅尼普体”场景。《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初访索尼娅和诵读《福音书》就属于这类场景中“几乎完美无缺”的一个。^⑤应该说，复调小说体裁来源从基督教转变为“前基督

^① 克林格、霍利科夫编《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家：传记词典》第1卷，莫斯科、圣彼得堡：涅斯托尔—历史出版社，2017年，第97页。

^② 《巴赫金文集》第2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

^③ 《巴赫金文集》第2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542页。

^④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巴赫金还在许多地方有意识地提及早期或古基督教文学、中世纪拉丁化基督教文学中发生的狂欢化现象，参见第146、154、155、164、172、174-176、184页。

^⑤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教”时代的民间笑文化，是巴赫金经历整整10年的小说体裁专题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1930年3月25日，携妻启程前往流放地前几天，巴赫金写下了提纲《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①。这是研究长篇小说体裁这项工程的蓝图，其后巴赫金10余年的学术探寻，基本上未脱离此蓝图规划。尤其是，他看到了不同于史诗—小说的第二条修辞路线，在追寻这条路线上发展起来的小说体裁渊源时，发现了民间笑文化现象，并在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中寻找证据，将之命名为民间狂欢节文化。从文化根源上拓宽了体裁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最终为复调小说体裁是文学狂欢化不断演变的结果提供了理论依据。这里使用“最终”一词，是因为客观上达成了这一结果。那么，巴赫金是否从一开始主观上就抱有改变复调小说之体裁来源的目的？

1911年，俄国象征主义诗人、理论家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Viach. I. Ivanov）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小说—悲剧”的讲座。他吸取小说源自史诗的观念，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作是史诗与戏剧的融合形式，将之取名为“小说—悲剧”：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一面是抒情诗和史诗性抒情作品，包容诗人的一切自说自话，另一面则是戏剧，涵纳诗人有意让各人物开口说出的一切话，它们实质上是两种自然天成而无杂质的文学类型，而史诗呢，将来自抒情诗的东西和来自戏剧的东西容纳于一身。史诗具有这种混合特性，因为其来源乃是原始社会的综合性艺术，在那里它尚未从神圣的音乐—合唱演出和化妆表演中分离出来。历史根据就是如此，而我们因此不应该把小说—悲剧视为是对纯史诗性小说的歪曲，而应该看成是对它的丰富，以及对其所固有之全部权利的恢复。^②

1916年讲座稿被作者收录于文集《犁沟与田畴》出版。“小说—悲剧”范畴为文学体裁大家庭增添了一种新样式，是其首创者心目中未来有望复兴悲剧体裁而非卢卡奇寄望复兴史诗体裁的先驱形式。“涅维里哲学小组”的成员们十分重视“小说—悲剧”理论。重要成员蓬皮杨斯基（L. V. Pumpianskii）深受启发，开始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古希腊、罗马》（1922）一书。1919年夏季，小组成员们专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问题。巴赫金为小说研究新路径的出现而欢欣鼓舞，但不认同把小说与悲剧结合起来的说法，讨论中他成了“小说—悲剧”观最有力的反对核心。“亲爱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即巴赫金——本文作者注），那您就系统研究、分析、补充吧！”^③蓬皮杨斯基对巴赫金提出了深入探究的要求，这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问世的最直接动因，从中亦可看出，他们并不纯粹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在质疑、探寻小说有否真诞生了一种新形式。

从《巴赫金文集》第2卷的题解来看，“涅维里哲学小组”的质疑和探寻存在明暗两条线索。质疑是明线。“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开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时代”，然而他使用了“错误的词汇‘悲剧’‘俄罗斯的悲剧’”^④，“第一个摸索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基本结构特点的，是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⑤。探寻是暗线。既然不同意“小说—悲剧”观，那怎么界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体裁才合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巴赫金并没有抛开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而是继续追问其提出小说—悲剧范畴的思想源头。

直接源头显而易见是尼采的酒神精神理论。日神与酒神（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两种精神的对立，推动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发展。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是始终一贯的

① 《巴赫金文集》第3卷，莫斯科“斯拉夫文化诸语言”出版社，2013年，第7页。

②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长篇小说—悲剧》，载《犁沟与田畴：审美与批评初探》，莫斯科“穆萨盖特”出版社，1916年，第18—19页。

③ 《巴赫金文集》第2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434页。

④ 蓬皮杨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古希腊、罗马》，彼得堡，1922年，转引自《巴赫金文集》第2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435页。

⑤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尼采追随者，其《苦难神：希腊化时代的宗教》《尼采与狄奥尼索斯》《瓦格纳与酒神事件》等文章，对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在1923年的专著《狄奥尼索斯与原始酒神精神》中，他通过对尼采、酒神、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详尽分析，展示了自己的文学立场：

尼采强烈地促使我去研究狄奥尼索斯宗教。《悲剧的诞生》的天才作者，展现出当代性中的超时间精神因素，这一因素活跃着生活，仿佛是其第一引擎。他认为这一因素的激发是一切更新的保证。而更早，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用自己的语言，借对“贴近”尘世、“喜悦与癫狂”的宣扬，想要说明的是否也是同一个东西？是不是两人都相信狄奥尼索斯，相信他是“解决问题的人”，即依据叔本华关于他人眼中某人“孤独”与“隔膜”的思想和术语体系来解决如何摆脱“个性化”桎梏的问题？实际上，两人谈论的是同一种力量，然而两人的意志差别甚远，期望大相径庭，彼此互为论敌，一个是有意识地对抗柏拉图，另一个是无意识的柏拉图主义者。^①

顺着被引者的思路，巴赫金自然找到了尼采这个源头。“如果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长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之思想观念的直接来源，其理论建构背后的尼采《悲剧的诞生》（1872）一书则是隐藏的来源。”^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修订草案里，巴赫金未注明尼采之名而暗引其书“取代悲剧对话的‘苏格拉底对话’，乃是长篇小说新体裁史上的第一步。”^③尼采的“对话一小说”观是建构复调小说理论的思想源泉之一，准确地说，巴赫金不满于“小说一悲剧”观，返回源头——尼采《悲剧的诞生》——寻求灵感，初步形成了复调小说理论思想，这是巴赫金“第一次专门研究小说理论”^④。在这一时期，他其实已暗中受到尼采的影响，不过他更倾向于把复调小说体裁的渊源追溯到基督教文献。随之而来的“转向”，缘起于完成提纲《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但没有想象中那么突然，因为“酒神精神”“苏格拉底对话”很大程度上早已埋下了思想伏笔，缺少的只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巴赫金又从其他渠道获得了建构民间笑（狂欢）文化理论的思想启示。

据俄罗斯学者波波娃（I. L. Popova）考证，拉伯雷进入巴赫金的视野，当在酝酿提纲的20世纪20年代末。1937年的论时空体一文及之前《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意义》的手稿，都用大篇幅分析了拉伯雷的笑。在写于1937至1938年间有关歌德亲历1788年罗马狂欢节的笔记中，巴赫金又不指名地暗引“新洪堡特派”创始人浮士勒（Karl Vossler）的“语词狂欢节（lexikalischer Karneval）”范畴，并提出了“狂欢节的思想·作为语词狂欢节的拉伯雷修辞面貌”的写作计划。由此可见，浮士勒及其学生施皮策尔（Leo Spitzer）对拉伯雷语言的研究，歌德对罗马狂欢节的生动描述，应是巴赫金形成狂欢化理论的第一思想来源。^⑤

从时序上看，巴赫金20世纪20年代末构思了提纲《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此后遵循该提纲研究小说体裁，发现了不同于史诗的另一种渊源，即民间笑（狂欢）文化，由此形成了巴赫金从倾向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本质特征归结为根源于《圣经》《福音书》《约伯记》的对话，向归结为根源于民间狂欢文化的“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体”的重大转向。这一转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突然，还因为它符合巴赫金本人的个性。在彼得堡大学求学期间，巴赫金参加了Omphalos学生社团。这类社团起源于西欧诸国，早期的斯威夫特就是英国类似社团中的一员。巴赫金与其志同道合者当年就亲近于讽刺别人同时也嘲笑自己的民间文化，都爱用笑来看待一切，笑看最严肃的人和事，笑

①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狄奥尼索斯与原始酒神精神》，圣彼得堡“阿列忒伊亚”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② 《巴赫金文集》第2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

③ 《巴赫金文集》第2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

④ 《巴赫金文集》第2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439页。

⑤ 伊琳娜·波波娃《弗朗索瓦·拉伯雷的“语词狂欢节”：巴赫金的书与20世纪一二十年代法德方法论之争》，《新文学评论》（俄文版）2006年第3期。

是他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成分。巴赫金的哥哥尼古拉创作的一部长诗 *Omphalos Epiphales*^①，近乎社团纲领，就很能说明问题。仅凭诗题和序诗开头诗行，即能探得作者把神圣降格、使一切相对化的自由不羁、戏谑的创作立场。1971年12月19日，巴赫金在与弟子鲍恰罗夫(S. G. Bocharov)的交谈中，提到拉丁文滑稽人物是其大学生活的话题之一，“收集了大量材料，然后在30年代才回到这个话题”^②，语气中颇有“失而复得”的欣慰感。

复调小说体裁的来源从基督教转向古希腊、罗马，经历几乎整个30年代才实现的这次转向，在巴赫金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让读者有理由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论歌德的教育小说、论拉伯雷的狂欢小说3部专论，还有前面重点提到的有关小说理论的多篇文章，以及探讨言语体裁问题的未完成稿，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专论长篇小说体裁的大书。它由三编构成，第一编是三个小说名家的个案研究，第二编是针对长篇小说体裁源流的历史诗学研究，第三编是为作为“言语体裁百科全书”的长篇小说提供语言哲学基础的语言学研究。

三、新范式与“词汇库”

巴赫金晚年接受杜瓦金访谈，被问“您更多的是哲学家还是语文学家”，他答“更多是哲学家。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我是个哲学家，是个思想家”。^③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第1卷《1920年代的哲学美学》，收录巴赫金早期论著4篇和多次哲学讲座笔记，其中《文学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第一部即《文学作品的形式、内容与材料问题》）撰写于1924年5月至12月^④，与其他3篇文章相比，写得最晚，且哲学美学色彩淡化很多，作者主要批判了形式主义诗学的材料美学倾向，阐明了以普通美学为根基的重要性。继此文之后，直到1929年才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及至20世纪60年代，巴赫金再未回归早期所钟爱的纯哲学美学研究，即便到了晚年，哲学美学长篇大论也再未出现，而多为短小的札记式散思。由此可以确定，巴赫金学术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1919—1924年的早期哲学美学阶段；1924—1965年的文艺学/语言学阶段（或用颇具俄罗斯特色的术语表达，是语文学阶段）；1965—1975年的晚期人文散论阶段。

巴赫金从哲学美学向文艺学/语言学的转变，为其提供了尽情展现作为哲学家研究文艺理论的独特空间，小说理论的特色恰恰与这个转变及由此而来的独特空间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在早期哲学美学阶段，巴赫金提出了“存在事件”或“存在犹如事件”范畴，他把每个具体之人（我与他人）及其行为看成是犹如存在的事件整体，认为考察这样的整体，需要采用参与性思维而不是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独白思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成其心目中“第一哲学”的目标。不过，巴赫金没有采用纯哲学美学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语文学领域。诚然，正如巴赫金学界公认的那样，这一转变具有很深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外因终归只是外因，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内因——符合巴赫金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1929年的专著中巴赫金指出，“哲学上的独白化路径——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批评的基本路径”，研究者无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看作是“由一个统一的世界观支配的独白体系

① *Omphalos* 在希腊文中原意为“肚脐”，引申义为“中心”；拉丁文 *epiphales* 是基督教术语，指“上帝的显现”即“圣显”。两词组合成诗题《肚脐的显现》，诙谐效果跃然纸上。诗作未能保全下来，巴赫金只背诵了序诗开头8行（“昭示神秘圣徒信仰的人哪，/我来到了你的面前。/我曾得到过潜来猛豹的温存，/也曾目睹了不敬神祇者的酒筵。//有两百零八个民族的女人，/永远花样翻新地将我抚爱；/我熟悉她们那多彩的情爱之梦，/她们快慰时慵懒无神的醉态……”），已足以让读者窥探诗人创作个性之一斑。参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83-387页。

② 《巴赫金文集》第2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472页。

③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80页。

④ 《巴赫金文集》第1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斯拉夫文化诸语言”出版社，2003年，第711-712页。

的框架”^①而在巴赫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长篇小说结构的一切要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获得深刻的独特性；所有要素都取决于一个新的艺术任务，这个任务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提出来，并在极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加以解决。这就是：创造一个复调的世界，并且打破已经定型的、基本上是独白式（单旋律）的欧洲小说诸形式。^②

以对话艺术思维为核心的新型小说即复调小说体裁，是能够抵御“哲学上的独白化路径”的强劲力量，这应该是巴赫金义无反顾地从哲学美学转入语文学领域的主要内在动因。在追踪复调小说体裁渊源时，他又发掘出民间笑文化及其“文学狂欢化”倾向，从而在其论域中形成了颠覆独白思维倾向的对话与狂欢两种既联系又相异的思维倾向。这样看来，巴赫金别具匠心建构小说理论，背后隐藏着对独白思维倾向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文化的不满，同时还有对与之针锋相对的思维倾向的不懈追求。

巴赫金以诗学之形构建有哲学之实的小说理论，其中独白与反独白思维倾向相互斗争又彼此颀颀的关系是隐而未显且又最引人入胜的特色。^③这个特色实际上涉及巴赫金整个学术遗产是否具有体系性、整体性的问题，而有关这个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本文作者曾引入“问题域”概念，即阐发某个问题可以构成思考各种文化现象的专门领域，借鉴俄罗斯学者诠释巴赫金哲学思想的成果，提出了巴赫金学术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和有机的体系的观点。^④体系确实存在，只是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体系，也不同于20世纪哲学—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体系，而是以语文学（主要是小说理论）为主要内容，前承早期哲学美学思想，后续哲学人类学思考或人文散思，构建起来的人类独白思维倾向与对话—狂欢思维倾向互动关系的体系。戈戈季什维利（L. A. Gogotishvili）在解读巴赫金时详细论证了若干独白思维倾向与由对话—狂欢构成的反独白思维倾向的互动关系，^⑤能够符实地说明俄罗斯思想家一生的学术求索，而求索的结果足以引发“哥白尼式的革命”，可惜这一结果至今未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更无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明晰、深入而全面的阐发。当然，有关这两大思维倾向互动关系的理论洞见，不管有意或者无意、主动或是被动，研究者都从中不断地获得启发。在美国，学术思潮更新换代迅速，红极一时的“学术明星”“知识界的崇拜对象”更替频繁；仅就俄罗斯学而言，从过去炙手可热的苏联学变为现今的斯拉夫学，式微态势相当明显，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塔尔图—莫斯科结构主义历史—文化符号学派等的理论家们，无一例外纷纷淡出了研究视野，唯有巴赫金一枝独秀，坚持的时间最长，“除了巴赫金之外，斯拉夫学系再无任何东西能把研究生们深深地吸引住了”^⑥。西方的巴赫金研究在“热劲”过后出现的新常态^⑦表明，即便是在学术思潮快速更迭的美国，若用钱中文先生的话来形容，巴赫金的“理论”依然“是常青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文艺学与语言学合为一体的语文学形态探索哲学研究新范式，从客观结果看，成就了小说理论，也催生了迄今仍未得到应有重视的哲学思想。这恰恰是巴赫金与包括形式主义者在内的同时代俄罗斯语文学家的最重要区别之所在。作为形式主义学派的外围成员，苏联科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多夫晚年专门谈及该学派兴起的原因。在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1914—1924）再变为列宁格勒的前后20年里，一批青年学子深受博杜恩·德·库尔特内（Baudouin de Courtenay）和沙赫马托夫（A. A. Shakhmatov）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对当时的俄国语文学现状极度不满：大学语言学课大都教授死板的语法规则，偶尔会以历史语音学为例来说明，无人关心各类文学作品中语法形式

① 《巴赫金文集》第1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斯拉夫文化诸语言”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② 《巴赫金文集》第1卷，莫斯科“俄罗斯词典”出版社“斯拉夫文化诸语言”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③ 凌建侯《诗学的形态与哲学的诉求——巴赫金小说理论的学术功绩》，《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④ 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21页。

⑤ 戈戈季什维利《巴赫金的变体与正体》，《哲学问题》（俄文版）1992年第1期。

⑥ 亚姆波里斯基·米哈伊尔《关于学术机构的个人笔记》，《新文学评论》（俄文版）2001年第4期。

⑦ 张凌燕、凌建侯《“后理论”时代中国巴赫金研究新动向》，《外语教学》2018年第3期。

的运作规律；在文学课堂里千篇一律讲解使徒行传，偶尔会引入文化史和神秘主义视角，无人关心作品的内生艺术特质。如此课程内容绝非学生所期待。他们想学什么？当然是如何揭示文学本质特征的办法。于是他们在课堂外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的关系，“诗语研究会（奥波亚兹）”便应运而生，后来又联合“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共同寻找解决文学特质问题的方法，主动接触谢雷多宁（С. М. Середонин）的历史地理学和浮士勒的新语文学，阅读克里斯特安森（Broder Christiansen）的《艺术哲学》，还有诸如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让-保罗·里希特（Jean-Paul Friedrich Richter）、缪勒-弗雷恩菲尔斯（Richard Müller-Freienfels）的美学论著，“不过他们都未提供任何范例”^①。形式主义者先研究较容易把握的诗歌言语的特质，自然而然地碰到了有否合法性的问题：涅克拉索夫的诗歌言语被证明不具有诗性，而诸如夏多布里昂与屠格涅夫的小说言语充满了音乐性（诗性）。于是他们不得不扩大研究视野，开始涉猎小说言语。然而，研究长篇小说时，很难涵盖诗性（文学性）的全部要素，往往只能选取一两个方面进行解析，《小说〈黑桃皇后〉的节奏》《屠格涅夫小说的旋律》《语言学视角下的诗歌与小说》等论著，无不说明了这种两难的窘境，而且由此还产生了更重大的问题：怎么研究作品整体的形式？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中？整个审美客体通过哪些手段得到呈现？一言以蔽之，怎么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在诗性整体？应该说，整个形式主义学派所做的种种努力客观上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联系《巴赫金访谈录》第二节的内容看，维诺格拉多夫对形式主义学派之形成原因及其所讨论问题的上述梳理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当时“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被施佩特的美学论著所吸引，把他介绍给了列宁格勒的“奥波亚兹”。施佩特的学说同样无法令列宁格勒的年轻人满意，只有施佩特关于体系与结构关系的观点被他们悄悄地且不标明出处地应用在了自己的论著中。^②这个观点为形式主义者研究作品整体的艺术本质特征提供了启示，经他们发扬，特别是后来被索绪尔语言学思想所完善，对20世纪中期莫斯科—塔尔图结构主义历史—文化符号学派的诞生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体上看，形式主义者和巴赫金一样，都受到了德国哲学美学思想的熏陶，都试图从德国学术中寻求解答自己问题的方案。不过，形式主义者钻研哲学美学论著是为了解决诗学问题，巴赫金研究诗学隐藏着解决哲学问题的努力，两者的研究起点与内在逻辑、学理架构与思维格局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巴赫金作为语文学家与形式主义者不可能不发生学术联系，尤其在诗学研究方法和文学体裁领域，两者分歧很大，但共同推动了俄罗斯语文学派的发展^③；巴赫金作为哲学家，其理论学说，特别是其所建立的人文科学新范式，超越了具体学科范围，是形式主义文艺学及紧随其后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文艺学所无法容纳下的。

从哲学美学转向语文学，由此形成的独特空间，一方面令巴赫金拥有了谋划上节所述之大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让其论著令读者感到很不适应，众多借用和自造的术语带有“隐喻”色彩，字面浅显直白，含义却令人捉摸不定，有人批之为缺乏严谨性，有人对之进行“适应性改造”，但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读者都表现出“有话要说”的激情。与文论界刚开始时的不适应相比，哲学界则始终表现出“敬而远之”的姿态，只有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思想得到了个别哲学家的认可^④与接受^⑤。这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毕竟巴赫金的绝大部分重要论著都是以语文学的形态见诸读者的，而且潜藏在其整套范畴背后的学术新范式，足以改变人文研究之基本格局。“科学革命是打破传统的活动。”^⑥破旧立新通常在危机时刻或反常时期，但新范式（新理论）从诞生到被学术共同体接受并不一帆风顺。

① 维诺格拉多夫 《1920年代诗学研究史》，《苏联科学院学报》（文学与语言版）1975年第3期。

② 维诺格拉多夫 《1920年代诗学研究史》，《苏联科学院学报》（文学与语言版）1975年第3期。

③ Igor Shaitanov, "Aleksandr Veselovskii's Historical Poetics: Genre in Historical Poe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2, 2001, pp. 429-443.

④ 哈贝马斯 《我们的访谈：哲学家——自己时代的诊断家》，《哲学问题》（俄文版）1989年第9期。

⑤ 吉尔·德勒兹 《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⑥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范式提供的工具能继续表现出有能力解决它所规定的问题，通过有信心地使用这些工具，科学就能得到最快和最深入的发展……更换工具是一种浪费，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这么做。”^① 巴赫金早期所处的时代，正是本应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科学、艺术和生活的统一意义被人为消除的时代，科学主义把人客体化的独白思维倾向引领整个文化发展的时代，欧洲陷入“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②“欧洲诸民族病了”^③的时代。别立新意创建新范式虽正逢其时，但想要为整个哲学界所承认与普遍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巴赫金奉献了人文研究“独白论与反独白论思维体系”这一新范式，为此独创了不少新范畴，采用“自铸新词”和“旧词新意”的方法，捉对使用许多通俗易懂甚至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概念，如“独白—对话”“独白性—对话性”“独白小说—复调小说”“句子—话语”“作者直接话语—非作者直接话语”“标准语（统一语、规范语）—杂语”“向心力—离心力”“史诗—小说”“完成性—未完成性”“诗歌性—小说性”“庄严（严肃、崇高）—笑（诙谐、戏谑）”等，还有描述“狂欢节”世界感受的“官方文化—民间文化”及其意蕴丰富的延伸概念，如“狂欢化”“文学狂欢化”“意识狂欢化”“常规生活狂欢化”。为了阐发由“对话—狂欢—小说—话语—杂语—离心力—未完成性—笑”等系列范畴构成的反独白文化思维倾向的特征，同时也为了阐明长篇小说体裁的特殊性，为了将其上升到缘起性体裁之一，并提高其辨识度，巴赫金还采纳了诸如事件、行为、双重性、言语体裁、小说化、时空体、混合、语调、镶嵌、讽拟（戏仿）、声音、多声性、他人话语等概念。上述种种词汇在巴赫金学术遗产的语境中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已被文学与文化研究者所采信，俄罗斯学者甚至专门编写出版了《巴赫金词汇库》^④，详细解释这一整套术语及其内在关联。令人遗憾的是，国际哲学界对此反响甚微，究其原因，不外乎与现行哲学范式扞格不入，“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⑤，所以得不到哲学共同体的普遍承认。

考察巴赫金小说理论，如果离开其诞生和被发现的时代背景，很难认清他为什么热衷于探求欧洲文化史上由对话和狂欢所构成的反独白思维倾向；如果不深究其本人学术发展的线索，很难深刻认识到诗学之形与哲学之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如果不深入阐发他特有的“词汇库”，很难真正领悟其富有革命性的人文研究新范式。总之，巴赫金研究小说理论，隐含着对独白论与反独白论思维关系的思考，这足以引起研究者深思。在追求平等对话生活方式的当代，共享作为一种理念已成共识，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以反独白思维为根基的“共学理论（Co-ism Theories）”，或可成为巴赫金提供给东方文化的重要启迪之一。

承蒙钱中文先生抬爱，遵嘱撰写中文《巴赫金全集》第三版第三卷之序，遂得拙作两篇，此为其二，芹献于读者。写作过程中得到钱中文、白春仁两位先生的悉心指点，在此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王艳丽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58页。

③ 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危机》，吕祥译，上海：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④ 塔玛尔钦科编《巴赫金词汇库：材料与研究·文集》，莫斯科：俄罗斯人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⑤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An Exploration of the Everyday Life in Chengdu in the 19th Century in Zhuzhi Ci

Wang Di (121)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ublic everyday life in Chengdu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embodied in Zhuzhi Ci (ancient folk songs with love as their main theme), which,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lyric poetry, largely records people's real life. Because of this feature, Zhuzhi Ci is rich in info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which, however, is usually a gap in conventional historical data. Zhuzhi Ci also provides insights into how local elites viewed ordinary people and popular culture. Historians of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ncreasingly use literature as a primary source of data, including scripts of local operas, popular novels, and proverbs. However, scholars failed to fully recognize the value of Zhuzhi Ci as a sourc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ir poems, they judged popular culture and ordinary people, sometimes favorably, sometimes less so. Such a complex attitude result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 with the culture and the people. This paper offers two folds in use of folk poetry as a primary source: to uncover descriptions of the colorful public life in Chinese cities and to determine the attitudes of elites toward common people. This paper finds that Zhuzhi Ci could be analogized to the "rhythm of city", which indeed mimicked the rhythms of Chengdu, whose text lyrically described the atmosphere, feeling and consciousness of urban daily life.

On Bakhtin's Theory of Novel: Context,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Ling Jianhou (188)

1930s and early 1940s marked M. M. Bakhtin's specialization in fiction theory. After his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in English version in 1981, *Four Essays* was published. And consequently, "Bakhtin's Theory of Novel" prevailed as a special term in theoretical nature, influencing the old and more recent schools of novelistic studies in the West. Study of novel served as a transition during Bakhtin's whole academic career, linking his early exploration in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to his late years' meditation over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n to his philological studies (both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studies) as a philosopher. Such a transition also made possible Bakhtin'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at began with his tracing the origins of Dostoevsky's dialogical thinking first to Christianity, then to the culture of folk laugh, continued on to his discovery of anti-monological thinking as comparable to his early criticism of monological thinking, and finally reached his establishment of the cultural system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ologism and anti-monologism, which was not so much concerned with poetics as with philosophy. It is without doubt, given the origins of his studies and their inner development, the scale and framework in his academic thought, Bakhtin's theoretical heritage goes far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literary studies as represented by Formalism and the subsequent Structuralism.